

转型新动力

企业减税清费的供给侧研究

彭鹏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转型新动力

企业减税清费的供给侧研究

彭鹏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新动力:企业减税清费的供给侧研究/彭鹏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476-1088-6

I. ①企… II. ①彭… III. ①企业管理—税收管理—研究—
中国 IV. ①F81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7252 号

转型新动力:企业减税清费的供给侧研究

彭 鹏 著

特邀编辑/余彦焱 责任编辑/程云琦 装帧设计/李 廉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昆山亭林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装订:昆山亭林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9.75 字数:164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088-6/F·574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38

自序

供给理论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欧美多个国家采纳并应用于政策,帮助这些国家迅速地走出了“滞胀”低谷。近几年,我国需求侧管理政策的效果开始有所打折,因此实务界和理论界也出现了要求关注供给侧的宏观政策、通过对企业减税清费激发供给侧活力的呼声。2015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需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其作为我国“十三五”期间改革的战略重点方向。

本书是笔者在 2014 年 6 月提交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本书以企业为切入视角,在系统研究国内外供给理论相关文献和企业财税负担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政策、实证和案例等不同方面研究了“对企业减税清费的意义”和“如何减税清费”这两个问题。本书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加入经实证检验支持的供给侧条件,即边际税负与投资的负向关系,从而得到了拉弗曲线观点成立的条件;在新古典框架下尝试构建考虑中国国情和供给侧创新函数的理论模型,推导并检验支持了边际资本税率与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关系命题。为将理论结论实际应用于指导政策,本书梳理了企业收入流中的供给侧要素与需求侧的关系,通过对企业的分要素密集类型弹性分析和厘清财税政策传导机制,尝试解释了当前我国需求侧管理政策成效式微的症结,给出了从供给侧改善企业收入流的要素供给的政策抓手,即政府通过减税清费政策要达到的两个效果:第一,鼓励社会投资创办小企业吸收就业;第二,鼓励各层次企业的自主创新。本书随后针对如何减税与清费的问题,对企业减税进行分税种分析,指出增值税(结构性减免)、营业税(“营改增”)和企业所得税等税种是可以重点减免的方向;并通过刨除法、构成法和供养比法综合匡算得到我国企业费负担规模为 1.2 万亿—1.3 万亿元,从而为企业清费减负给出政策空间和操作方向的参考。最后,针对鼓励创新的财

税优惠政策和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问题,本书分别进行了案例讨论,以案例说明供给侧财税政策对促进创新和为小微企业减负的意义。

本书认为,在我国通过从供给侧实施减税和清费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负担,一方面鼓励小企业发展、吸收就业,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各层次企业的创新,从而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其中,结构性减税和“营改增”是减税政策需要关注的重点;具体政策操作中,清费可操作的减负幅度要大于减税。

结合 2015 年末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传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本书最后针对我国新供给经济理论和相关政策的进展进行了一些分析与再探索尝试,并由此将本书已经达成的部分结论与当下正在进行的改革联系起来。

中国当下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理论,不是对西方供给理论的简单继承模仿,而是针对我国国情、发展特色和现实需要提出的经世济用之学。笔者有幸于 2012 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便在导师周天勇教授的指导下较早开始了对供给理论的相关研究,随后有幸加入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继续跟随中国新供给经济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贾康教授,以博士后的身份学习和研究新供给理论。笔者愿自己的这本小书能够成为未来我国供给理论研究中的一缕烛照之光,照亮后来人的前行之路。

在本书行将出版之际,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周天勇教授和师母张弥教授,以及我目前的博士后导师贾康教授,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这部书就不可能完成。还要感谢出版过程中师叔刘正山副教授的热心帮忙,以及上海远东出版社徐忠良社长的大力支持。

最后这本书还要献给养育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妻子曹亚丽女士,亲情的陪伴是这本书得以诞生的最大助力,未来我只有通过更多努力来回报他们。

彭 鹏

2016 年 4 月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1
1 引言	1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1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3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3
2 关于供给侧和企业负担的前人研究	6
2.1 供给理论思想起源	6
2.2 围绕供给理论展开的论战	8
2.3 供给理论的规范化表达尝试	20
2.4 供给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	23
2.5 西方供给理论：争议与褒贬不一的中国启示	25
2.6 我国的总体税负情况	26
2.7 我国的结构减税与企业减税	29
2.8 我国企业面临的供给侧问题	32
3 考虑供给侧条件的理论框架	34
3.1 供给侧分析的理论前提	34
3.2 考虑供给侧的凯恩斯框架	36
3.3 考虑供给侧的新古典框架	43
4 企业收入流的供给侧分析	54
4.1 企业收入流中的供给侧要素关系	54
4.2 我国需求管理模式下存在的问题	59

4.3	供给侧理顺企业收入流的思路	65
4.4	企业收入流分析小结	71
5	企业减税的分税种分析	74
5.1	企业承担的税种概览	75
5.2	货劳税的减税方向分析	78
5.3	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方式分析	90
5.4	企业分税种减税小结	91
6	企业费的负担规模分析	94
6.1	企业费的概念与构成	94
6.2	匡算企业费的规模的方法	99
6.3	企业费规模匡算	104
6.4	关于企业费负担的思考	107
7	企业案例研究	111
7.1	中关村示范区的案例研究	111
7.2	小微企业税费负担案例研究	127
8	结论与供给侧“再探”	133
8.1	本书主要结论	133
8.2	再探“供给侧”	135
	参考文献	139

引言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需求管理政策,自 20 世纪西方世界“大萧条”以来,被认为是应对经济下滑的有力措施。然而自 2007 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稳定运行也造成了冲击,企业的经营遭遇了一定的困难;与此同时,国内的劳动力结构和市场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经济结构处于进一步转型之中。需求管理政策在我国近几年中的执行效果,相对预期总是有所打折。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出现了要求关注“供给侧”(supply-side),并将其运用于财政政策,结合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的声音(张平,2010;孙建波、秦晓斌,2012;任寿根,2012;滕泰,2012;滕泰,2013)。而时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2013)七位学者,联名组成了新供给理论研究小组,提出了新供给理论的理论框架^①;他们提出,需要采取供给侧政策提升企业活力,而不再是仅仅依靠扩大投资等需求侧政策来刺激经济。2015 年 10 月末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十三五”规划的建议稿中正式提出了我国需要重视“供给侧”的提法,并在随后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了我国要将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未来一个时期中的战略重点方向。

^① 另外六位学者分别是: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李宏瑾。报告简介见《七学者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框架》,财新网: <http://economy.caixin.com/2013-04-01/100508938.html>;《“新供给经济学”的借鉴意义》,财新网: <http://economy.caixin.com/2013-04-02/100509069.html>。

供给理论(政策)和里根政府的“经济复兴计划”,共同翻开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第一页。供给理论指导的宏观政策依靠降低税收与公共开支、支持市场竞争、降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等手段,帮助美国实现了 80 年代后期的持续繁荣,走出了“滞胀”阴霾。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由撒切尔夫人主导的减税和私有化运动也同样获得了成功。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美国小布什政府执政时期,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遭遇了种种抨击和非议。但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依旧保留了对中小企业减税的相关措施,这也说明供给侧政策的效果是受到认可的。

鉴于当前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和国内企业经营活力有所下降的现实,结合理论与实务界对供给理论的关注,以及西方理论对中国的实用性问题,本书认为,对供给学派的思想由来和理论框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理论研究,分析其缺陷和不足,从而对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借鉴供给理论思想、完善宏观管理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企业了解、研究、分析和判断所处的宏观政策环境也非常重要。同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微观主体,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宏观政策,尤其是供给理论所主打的减税政策的影响非常显著。而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和微观行为主体,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相应的经济管理决策。因此,以供给理论为基础,研究企业的减税政策问题就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对企业的研究可以从微观层面自下而上地反馈宏观政策的管理效果,是对宏观政策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自身而言,研究当下国家结构性减税等宏观政策的大环境,对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决策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就供给理论在西方的发展,结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管理政策实践,本书认为梳理和研究中国背景下的供给理论至少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 (1) 在中国研究供给理论的基本前提与西方有什么异同?
- (2) 中国的供给侧政策传导逻辑是怎样的?

解决好以上两个问题,不仅能够确立在中国应用供给侧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能够为理论指导实践给出明确的政策抓手。同时需要注意到,供给理论的主要政策取向是减税。在我国,企业所承担的间接税是税收总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中国研究减税问题的对象应当是企业。而提到企业的减税问题,还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除去税收负担外,费负担也是企业的财政负担之一。因此,本书讨论对企业减负的供给侧问题,不仅需要讨论减税,也需要讨论清费。因此,在明确了研究对象后,接下来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即为:

- (3) 对企业减税清费政策需要倡导的政策方向和政策抓手是什么?

在弄清了对企业减税清费所要达到的政策效果或者目的导向后,就应当进一步解答,在中国如何施行减税与清费政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细化分解为两个方面,即:

(4) 对企业减税主要减哪种税? 对企业如何减税?

(5) 需要为企业清多少费? 哪些费可以清?

由此,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就形成了在中国研究供给理论和供给侧政策的大背景。带着以上所列的需要研究的问题,作为展开分析的思路,本书将逐个进行相应的研究,并尝试一一给出答案。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国内自 2009 年以来就存在各种声音提醒宏观经济管理的决策层,我国可能面临着类似西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风险。但尽管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却也不尽相同;我国的经济体制、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背景,都与 20 世纪初那场危机时有所不同。中国不可能原样拷贝当时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方式来避免发生滞胀,也未必能就此通过类似的政策,促成一场类似美国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局面。

因此,在我国背景下研究供给理论并应用于企业的减税清费,对于我国宏观理论研究和相关政策实践都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充分理解供给理论思想的基础上,理顺其内在逻辑框架,并尝试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融入其理论观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构建理论分析模型;

二是在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给出在我国实行对企业减税清费的供给侧政策所应达到的政策效果,为相关政策提供方向性意见;

三是通过研究企业的税费负担,尤其是费负担的规模,可以为宏观经济管理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和施政空间参考,对政策方向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是关于供给理论的自身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层面的研究。本书将供给理论视作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思想中的一个流派,一种分支,但同时也尽可能寻求将其融入经典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和现代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之中。从而,本书将从这两个角度^①切入,分别在两种框架下尝试建立包含供给侧因素的理论模型。同时,基于理论结合数据对模型的条件或推论的实证检验。本书将通过实证检验对关键的条件和命题进行研判,希望得到实证支持理论的结果,同时为下一次层次分析建立研究前提。

第二,是从微观的、企业的层面出发,根据收入流理论,梳理企业的收入和背后的政策传导逻辑,从而得到对企业进行减税清费所期望达到的政策效果或政策抓手,进而达到通过供给侧政策改善整体经济良性循环的目的。

第三,是对企业减税清费政策具体实施方面的分析。这里研究包含减税和清费两个方面,不仅在于分析企业面对哪些税种、哪些税可以减,减税方式如何,同时需要对企业费负担,尤其是费的规模进行匡算,通过估计其规模,给出清费政策的操作空间。

最后,是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进行的案例研究。由于促进自主创新和扶持中小微企业是目前以及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的政策重点,^②研究它们对减税清费政策的实际需要,将为未来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论据。但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的匮乏,因此案例分析将是可取、可实现的主要研究手段。

全书的主要结构如下:

第一章:引言。介绍问题的背景、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并对全书的篇章结构进行交代。

第二章:关于供给侧和企业负担的前人研究。对供给学派的相关理论及政策文献进行综述与评价,同时对国内税负、结构性减税及企业减税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中寻找我国企业所面对的供给侧问题,为后文的分析引出切入点和方向。

第三章:考虑供给侧条件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基于经典凯恩斯宏观框架,考虑供给侧的因素建立模型,以期能够让原本不支持供给理论观点的凯

① 分别从两个框架建模的另一个原因是,(第二章文献综述会提到)供给学派自身分为“新”“老”两个派别,老派注重从凯恩斯框架出发涵盖供给侧分析,而新派则完全脱离凯恩斯框架进行理论构建。

② 第四章中的分析也表明,自主创新和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是改善企业收入流所应达成的两项重要政策抓手。

恩斯框架下也能融入供给侧观点;另一方面,基于现代的新古典宏观理论框架,以企业为基本行为人,结合中国国情的相关研究建立模型并推导需要证明的命题,再结合数据对命题进行实证验证。

第四章:企业收入流的供给侧分析。通过分析企业面临的收入流,理解当前我国企业发展存在问题的症结,以及需求侧管理政策效果打折扣的原因所在。通过从供给侧找到理顺收入流的途径,提出促进创新和促进创业与小微企业发展是其中重要的两个抓手。

第五章:企业减税的分税种分析。这里从宏观税负、税制、税种和征管等不同层面,细分到具体的税种,具体分析我国目前企业所面临的主要税种、税率和实际负担情况,从而给出对企业减税重点应当减哪些税、怎么减。

第六章:企业费的负担规模分析。采取刨除法、构成估算法和供养比推算法三种不同角度,对企业费负担的规模进行匡算,并将不同方法估计的结果折中调整,得到企业的费负担的相对合理的估计中值和估计区间,进而为清费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第七章:企业案例研究。这里分为两部分案例。第一部分是对科技型企业园区促进创新的财税政策的调查案例,第二部分则是对两家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情况进行分析,进一步说明减税清费政策的意义。

第八章:结论与供给侧“再探”。对全书进行梳理和总结,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结合2015年10月底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当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相关提法,以及本书已经得出的相关结论和笔者参与学习的我国新供给理论的相关进展,对供给侧问题进行再探索。

关于供给侧和企业负担的前人研究

本书从供给侧对企业的减税降费问题进行研究,而供给理论是研究的基础。因此,这里有必要首先对供给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同时本研究还试图通过文献述评,寻找供给理论最本质的思想和理论逻辑,避免在将理论应用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时,面临着理论与政策前提不相符的问题,同时也为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供给理论找到突破口。

在对供给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后,鉴于本书的研究指向是企业的减税降费问题,因此本研究还对国内关于企业税负、结构性减税和小微企业减税等方面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回顾。通过这样的文献梳理,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需要研究而目前进展还不充分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挖掘。

2.1 供给理论思想起源

早在供给学派的著名人物拉弗(Laffer)绘制著名的拉弗曲线前,减税的思想便早已被提出和证明;目前可考的供给理论思想最早的提出者,是一位14世纪的名叫 Ibn Khaldun 的穆斯林哲学家。他在《历史绪论》一书中提出,每个朝代的兴亡都伴随着税率从低到高的过程。巴特利特(2009)指出,相关的证据可追溯至1971年《政治经济期刊》、1978年《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摘录,以及1981年里根总统在10月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对 Khaldun 的观点的引用。而 Nagarajan(1982)则通过细致的研究,指出这位穆斯林哲学家的思想与供给学派的主张存在一些区别:前者只是为了从历史的角度解释王朝的兴衰,并未由此提出控制税率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巴特利特同时认为《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在1728年的一篇关于课收重税的负面作用的文章,可能也影响了大卫·休谟、亚当·斯

密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在各自著作中提及高税率对经济有负面作用的思想。著名供给学派学者拉弗等人则认为是斯密最先解释了这一原理。而这些人 and 孟德斯鸠的思想,又深刻影响了美国首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对重税的批判。拉弗甚至认为托马斯·杰斐逊也是一名“供给派人士”。

然而追溯供给理论派思想来源时,不可回避的一位重要人物即为 19 世纪的知名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他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约翰·穆勒亦是萨伊定律的支持者。正因如此,许多凯恩斯主义学者抨击供给理论是早已被否定的“萨伊定律”的复活。杨鲁军(2009)的研究也认为,供给理论与萨伊定律的确存在诸多相同点。

供给理论的萌芽思想并不只在学术界出现。巴特利特的研究指出早在 1842 年,美国政治家约翰·卡尔豪提出的关税过高会降低关税收入的观点就已经被广泛接受——就连 19 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指出禁烟的最好方法就是将烟草税大幅提高,以至于无人买烟,从而该项税收收入为零。

到了 20 世纪,埃德温·坎南和科林·克拉克都曾提出过关于高税负影响经济和劳动力供给的讨论,并提出税率上限。而被供给理论所攻击的凯恩斯本人,也认同“25%的税率是可轻松承受的上限”。提出类似观点的著名学者还包括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49)、政治学家诺斯克特·帕金森(1960)和经济学家理查德·麦肯锡(1973)。

总之,早在拉弗 1974 年绘制出那条著名的拉弗曲线之前,高税率会减少政府税收这样的观点就已经被人提出和佐证了;拉弗本人也一再声明,拉弗曲线并非自己首创。

供给理论的思想既然古已有之,为何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异军突起,并迅速成为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的理论依据?这里存在着理论发展与当时经济现实的特殊原因。

Langdana(2009)在总结宏观经济理论发展时认为,从理论角度理解供给理论思想发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滞胀”。当时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特别是菲利普斯曲线都已经无法解释现实经济运行所遇到的问题。Langdana 从信息不对称和理性预期学派两个角度切入,改进了原本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AD-AS),从而在新古典综合的框架下得出了垂直的总供给曲线。此时无论如何通过扩张性政策拉动需求,都无法带来总产出增加,反而只会推进通胀加剧。这就解释了滞胀的病根,而相应的解决措施只能是设法令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因此,供给理论的政策恰好是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财政

政策。这与其他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即供给理论是在需求管理无法应对滞胀时的替代性理论(罗伯茨,1984;尹伯成等,1995;周天勇,1996;拉弗等,2010)。

Kates(2010)在研究相关文献后认为,凯恩斯本人并没能从理论上推翻萨伊定律,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政策实践已经说明凯恩斯主义的应对政策是失败的,需要重新回归和反思古典经济理论和萨伊定律。杨鲁军(2009)则认为,尽管供给理论是对凯恩斯主义的超越,但它也并没有彻底抛弃凯恩斯主义;在滞胀的背景下,以供给理论为依据的“里根经济学”是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从国家主导向自由放任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回归;尽管供给理论与凯恩斯主义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哲学基础,但供给理论也并非古典经济学的复古,而是对萨伊定律思想的否定之否定。

本研究认为,从后来者的角度自然能够以新古典综合等综述性框架,将凯恩斯主义和供给理论放置在更具有包容性的理论模型中,将其各自视为不同的特定情况来对待。然而从政策执行效果和时滞来看,需求管理政策要明显优于供给侧(supply side)的措施,因此凯恩斯主义首先大红大紫和供给理论随后的兴起,不过是历史在路径依赖的钟摆上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表现;目前的综合也只是从极端向中间的收敛。

2.2 围绕供给理论展开的论战

2.2.1 政策论战

George and Green(1986)在分析供给理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时,认为供给理论不应仅仅只是对某些代表供给的变量的强调,而应对经济政策有更多务实的贡献。事实上,供给理论在诞生初期(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就与美国的经济政策结下了不解之缘,并迅速且深入地影响了政策的决策过程。罗伯茨(Roberts)甚至认为,举起供给理论指导的政策大旗,正是共和党能击败意图连任的民主党的重要原因。由于凯恩斯主义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的巨大成功,多年来需求管理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并且统治了经济决策的过程,因此供给理论想要取而代之就必须经过激烈的论战。然而围绕供给理论展开的论战,并非首先在学术界打响,却是在政府决策机构的辩论、听证会和报纸等公众媒体平台上展开的。

罗伯茨的《供给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一书，以“内部人”(insider)的身份对自1975年来在美国政坛展开的政策论战进行了还原。书中提到，供给派学者主打的政策即为针对通胀导致个人所得税在累进税制下出现的所谓税级攀升(bracket creep)现象，建议实施大规模减税。共和党的减税政策在国会辩论遇到的最大质疑，是减税会导致政府赤字加剧(财政收支)，以及富人享受的减税更多(公平原则)。供给派学者们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论据，通过海关数据和肯尼迪政府减税等时期的数据，一方面证明减税具有税基扩大的抵补效应(off-set)，从而不会导致税收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也指出减税时富人所缴纳的税占总税金的比例反而上升。关于供给理论政策的具体施政范畴，Gramley(1981)指出，减收入税、商业税刺激和投资收入税刺激是供给派学者们关注的三个重要政策领域；具体表现在：(1)收入税影响劳动供给(人均劳动时间)，从而影响需求亦影响供给；(2)降低边际税率刺激商业投资进而影响生产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率；(3)提高居民储蓄从而支撑投资。以上三类政策在长期中可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抗击滞胀。

这场政策论战同样表现在学术刊物上的辩论中，其中不乏供给理论的支持者，如Kreps(1978)就提出税收政策对于劳动力供给面和私人投资都具有促进作用，旗帜鲜明地表明对供给理论的减税政策的支持。Heller(1981)对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的减税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了回顾，认为其刺激供给的手段有利于资本形成，并且当时的政策背景是政府的社保与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并不高，更有利于减税政策的实行。Keller(1982)也对美国历史上实行减税的各时期进行了比较，认为其政策都具有释放和促进商业内在发展动力的目的和作用，但具体执行的背景各不相同，因而效果也不同。Chimerine(1985)则直接评估了美国里根总统执政前期和施行减税之后的经济状况，讨论减税和供给侧政策的影响，并对联邦预算赤字进行了预测，认为美国经济随后将进入更平衡的恢复过程。而Miles(1988)从刺激主义者视角对里根的供给政策进行了保守的赞扬，认为其施政结果是税率下降、管制减少，且对政府支出的过分强调也被削弱；但里根的政策并非全面成功。他认为，关于供给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的施政方针区别，“刺激”一词可一语蔽之。

针锋相对反对供给理论政策的研究同样有很多。Peterson and Estenson(1985)回顾了美国经济衰退和恢复时期各个节点的事件，认为经济复苏都是由于凯恩斯主义而非供给政策；但由于会产生非计划内后果，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未来政府的施政决策中将难有所作为。Carroll et al.(1985)则认为供给侧管理仅仅对政府运行绩效进行了强调，而其他方面都是失败的。Cutler and

Summers(1988)对供给派学者 Victor Canto 的两个供给政策效果的证据更是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一方面,股票市场对 1986 年减税法案的反应说明资本的税率敏感性对于决定税率很重要——这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另一方面,市场对于税率改革的反应证明减税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质疑市场反应另有他因。他指出,低储蓄率而非税收的替代效应,才是当时美国公司发展最主要的障碍。但这些反驳意见都建立在需求管理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反馈经验上,缺乏长效的研究。

除针对美国国内的政策论战外,学者们的论战还常以其他工业国家的政策作为横向论据。譬如 Großer and Günter(1983)在评估了英、美、法三个主要工业国实施的供给理论主导政策后,认为尽管对投资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供给政策的反通胀效果是良好的。

然而反驳的声音也同样存在。Kazuo Sato(1985)认为在讨论政策有效性时,必须考虑供给理论的三个假定,即:第一,资本形成促进生产率增长;第二,资本形成受到公共政策刺激(尤其是税收对私人储蓄和投资的影响);第三,过度储蓄对供给政策不存在威胁。日本一直被供给派学者们视为供给侧政策成功典范,因而 Kazuo Sato 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美经济进行了比较,结论是:资本形成率由生产率决定,技术进步是自发的;美日两国公司税类似,收入税和投资税美国较高,但这不是造成日本储蓄高的根本原因;日本储蓄过多,但其失业率低,因此私人部门过度储蓄恰好与公共部门过少储蓄相搭配。因此 Kazuo Sato 认为日本的成功并非按照供给理论来运作。而英国经济学者 Marshall and Arestis(1989)则从英国经验的视角分析了供给理论,认为它不过恰好被鼓吹于各国“凯恩斯主义共识”衰落之时。美国的供给理论不仅是反凯恩斯的,也恰好顺应了里根政府的管理需要;同时减税的诉求也是非常值得营销的增长战略。因此他们认为供给理论里充斥着政治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相对折中的观点来自 Franz(1985),他论述了供给政策在德国的适用性,认为刺激供给与需求管理同样重要。

除国内政策的讨论外,90 年代后考虑国际背景的供给政策的讨论也开始出现。譬如 Roldós(1995)以规范的形式在一个两部门模型中,讨论了去通胀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本币升值和(贸易)赤字是由于供给侧的僵化而不是信用或价格黏性造成的,因此不建议实施资本控制或收入政策,而应当关注供给侧的层面。

本研究发现,这场政策论战中双方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体制和成熟市场背景的论据来展开政策效果辩论的。因此不论胜负如何,其结果都无法为发